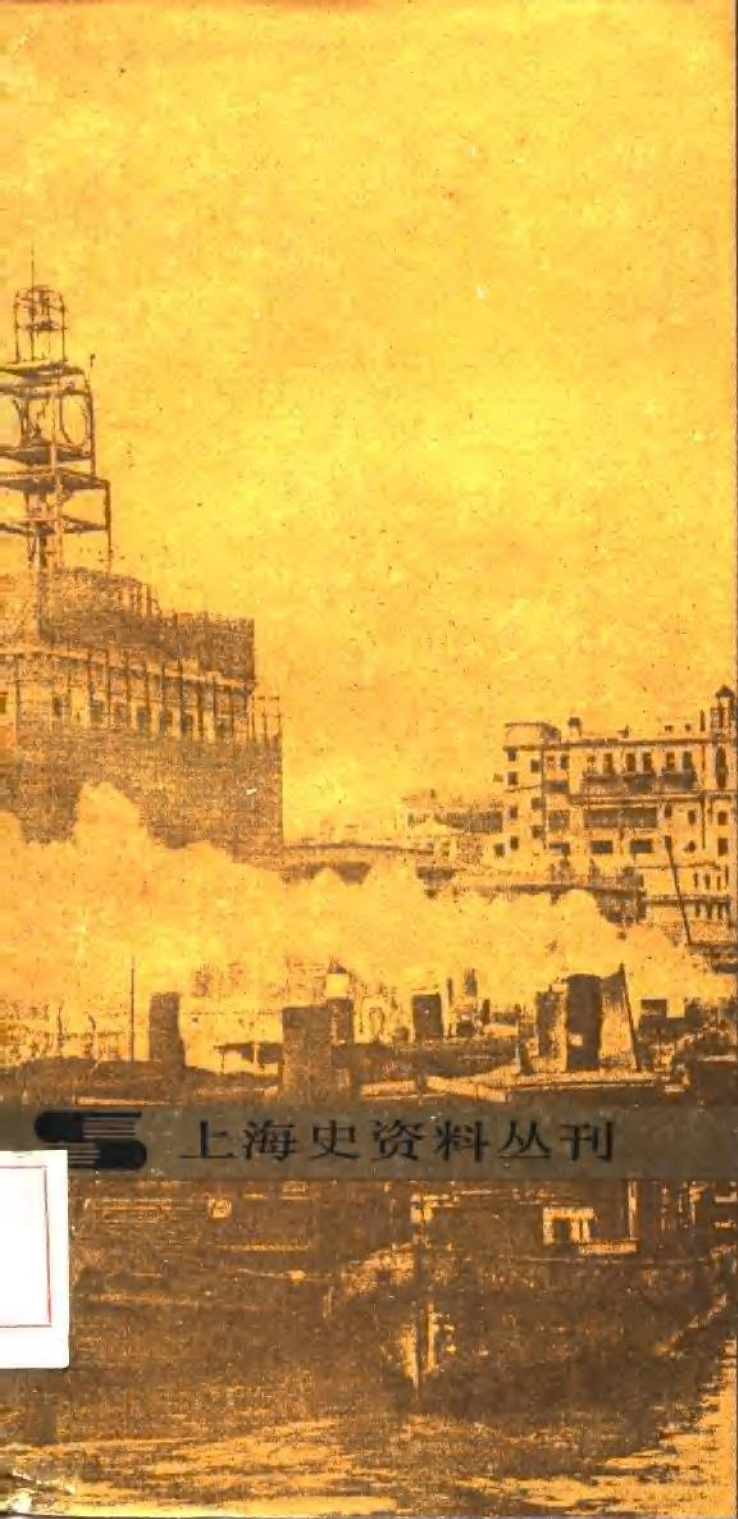




上海史资料丛刊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上海史资料丛刊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美〕 罗兹·墨菲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平岗
封面题字 胡问遂
封面装帧 邹纪华

283

上海史资料丛刊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美〕罗兹·墨菲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字数 198,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

书号 11074·721 定价 1.45 元

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章克生、徐肇庆、吴竟成、李谦译。
全书由章克生校订、加注、定稿。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53**

译者卷首按语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著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就政治、地理、交通运输、贸易、工业制造等方面,重点突出地论述从1843年对外开埠到1949年解放这百余年间上海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用以说明上海的发展演变对中国的适应世界潮流和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罗兹·墨菲生于1919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现任密西根大学地理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秘书长,《亚洲研究杂志》编辑。他曾于1942年至1946年,即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战胜利的年代里,在中国,主要在华西一带参加工作。大概就在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情况,获得相当可观的感性知识。从中国回到美国后,他于1948年至1950年间,得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支持和资助,专心从事上海史的研究,终于写成了《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950年,他获得哈佛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他这部著作于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他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对亚洲各国城市和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除上述一书外,他的著作还有《城市作为变革的中心:西欧与中国》(1954年)、《十九世纪的中国》

(1972年)和《通商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1970、1974年),等等。

我们觉得,罗兹·墨菲这本书是一部国外学者所撰写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上海史,不论从其内容、结构、体例、写作方法,还是从他所掌握的比较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料来说,都可供我们在上海史研究上的参考。根据本书末尾所附的参考图书文献目录,共收录书刊246种,其中英文190种、中文38种、法文16种、德文2种。他撰写这部书,无疑是建立在一定数量的图书文献资料基础上的。

罗兹·墨菲这部著作的特色究竟在哪里呢?他这部书的特色之一,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和地理因素上面。除涉及政治历史背景外,他还从地理、交通运输、人口、粮食、贸易、工业制造等方面来刻画各时期上海城市形象的特征,叙述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本书许多篇幅,特别是论述上海的地基和地理位置、运输路线和内地贸易各章,都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明上海所处的有利位置,它的港口通过沿海和内河航道,特别通过长江水系各条支流,跟几乎包括半个中国的内地贸易区直接联系;同时通过外洋航线,跟西欧、北美、日本、东南亚诸重要港口联系。由于著者所掌握的图书文献中经济资料占较大的比重,他这部书还侧重在论述上海城市的经济演变上面。从1840年前后到1949年解放,上海从一个原来属于工业前经济体系的小港口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首要工商业城市,拥有全国对外贸易的半数 and 全国机械化工厂的半数,在全中国贸易和工业制造方面,始终扮演着支配全局的重要角色。单就侧重经济发展的论述这一点而论,在迄今为止外国学者所撰写的许多上海史专著中,罗兹·

墨菲这部书可以说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罗兹·墨菲这部著作的特色之二，就是从上海与全中国的关系，有时从上海与亚洲或世界各地的关系，来阐述和论证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演变。在阐述、分析和论证的段落中，在各项统计图表和表格中，他总是把上海跟中国或亚洲其他通商口岸的情况和数据比较对照。以人口状况为例，著者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选择上海城市发展的若干阶段，把上海和其他重要城市的人口进行比较。在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的初年，即1843—1849年间，上海的人口不过二十余万。著者引用了英国植物学家福钧(Robert Fortune)的游记中所载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和江浙一带各重要城市的人口比较数字。福钧于1843年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派遣来到上海，试图采集英国所没有的观赏植物的树苗和种子。1848年，他重新访问上海，这次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委托，设法把茶树的灌木林丛引进印度。他在《中国、印度茶乡之行》(1852年伦敦版)一书中估计当时上海人口只有27万，而杭州人口则为100万，苏州、南京、宁波的人口各为50万。他还提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六个城市，包括松江、嘉定、常熟、嘉兴、湖州、无锡，各自拥有与上海相等的人口。据罗兹·墨菲论述，从1843年至1895年大约五十年间，上海人口仅增长一倍，但是从未超过50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人口激增至200万以上。本书第九章谈到1925年的上海人口约230万。到三十年代，又增长至300万以上。著者列举1936年中国各主要城市的人口估计数字如下：上海330万，北京140万，天津130万，汉口120万，广州95万，南京65万，苏州、杭州、福州、南昌各为50万。在本书导论中，著者提到密集的人口总是跟三角洲

地带联系在一起。他把本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人口与东南亚的若干重要城市的人口相比。在孤岛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年代里，上海拥有 400 万以上的人口，而东南亚的城市河内、西贡、曼谷、仰光以及加尔各答，其中没有一个城市在人口数字上接近上海，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也只有人口 250 万。著者就是用这样比较对照的办法，或者用叙述上海与其他各地区和重要城镇之间相互关系的办法，使上海城市各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和面貌显得比较鲜明突出。上海决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如果脱离了全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和发展演变，单就上海论上海，那么谁也无法把上海城市各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生动而逼真地描绘出来。著者在本书各章中用相当的篇幅写长江三角洲地区，写长江及其重要支流，写中国的主要产茶区和主要产丝区，写与上海旗鼓相当的华南、华北诸重要港口，正是为了借此比较对照，陪衬烘托，使上海城市各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和面貌刻画得更加形象鲜明，条理清楚。

罗兹·墨菲这部著作的特色之三，就是在若干章节中适当地插入许多统计图表和表格。用著者自己的话，这些图表和表格时常可用以讲清楚一种无法用其他方式讲清楚的重要情况，或者用以说明已经掌握而尚未完整地理解的事实和概念。每张图表和表格都分别注明各自的资料出处。

罗兹·墨菲作为一个专攻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学者，尽管所持的立场、观点不可能跟我们相同，但是 he 在这部著作中所阐述和论证的，其中也有一些看法和论点，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是全书的中心论点。他认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里，中国第一次接

受西方强国所强加于它的炮舰外交、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外国殖民统治等惨痛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充满着侵略和扩张主义精神的“西洋文明”和闭关锁国、承袭传统的“中华文明”，开始走到一起来了。两种文明接触的结果以及中国对此所发出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上海诞生。上海处于南北海岸交通运输的中枢，东西方接触的要冲，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经商企业、工业制造、新型出版、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都在上海发迹；中国的经济变革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在波澜壮阔的黄浦江边生长出最早的现代根苗。在所有这些方面，上海提供了那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的锁钥。这正是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

罗兹·墨菲对于西方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建立外国殖民统治的行径，采取率直而严厉的谴责态度。他说：1843年英国当局与清朝地方官员商定在上海县城外划定一小块地皮为外侨居留地，外侨在界内有租地的权利，但是中国仍然在理论上拥有对整个上海的主权。然而所有与中国缔结条约的西方强国，却自称有权调派外国水兵登陆，驻在租界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那是完全没有任何条约或协议根据的。他还谈到：在外国统治期间，上海曾经被当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而著称于全球；外国租界内经营娼妓、鸦片窟、赌博等行业，从事绑架等邪恶势力猖獗。事实证明外国租界当局无法达成法纪和道义的统治。然而共产主义的胜利，终于结束了外国人统治上海的历史。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以其严肃而有道德的秩序，把原有的娼妓、赌博等邪恶而肮脏的事物一扫而空。过去外国统治者所永远做不到的事，如今中国共产党在短期间完全、彻底而有效地做到了。

罗兹·墨菲着手撰写本书时,尚在新中国成立的初年,上海正处于被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包围和封锁的状态之下。著者对上海城市发展的未来前途,抱着异常乐观的态度。据他观察,鉴于上海具备各项有利条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上海经济的成长发展将视它跟整个东亚和世界各地经由海道自由通航的恢复原状而定。在整个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过程中,上海只会更加可能成长发展,而不会走向衰落。于是他在本书结尾表露这样的预见: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逻辑和事实,将会使它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昌盛。

我们对于罗兹·墨菲这部著作抱着热诚欢迎的态度。就总的看法而论,他在不少地方跟我们有共同之点。然而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他对许多事物的论断和看法便跟我们不尽相同了。例如,原著第五章提到1832年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来华的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和郭实猎(Karl Gutzlaff),我们知道他们的来意主要是为了在中国沿海一带从事侦察活动,刺探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而本书著者却认为他们被派遣来华的目的在于突破清朝政府所规定的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埠的制度,他以称道的语气叙述他们的沿海侦察窥探活动,赞扬他们最早发现上海有条件充当西方商人来华贸易的最大港口,对上海发展的前景满怀信心,赞扬他们有眼光,有胆识。又如原著第三章首段盛赞上海开埠初期外国租界所设置的“道路码头委员会”,把它看作是“上海城市取得卓越地位的象征”。著者以为上海外国租界一开头就有了这样一个专管城市建设的组织机构,从而使它后来在数十年间发展成为一个与世界各地贸易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但是我们过去深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苦,知道所谓“道路

码头委员会”是1846年英租界租地人大会所产选的机构，专管征税修路等行政事宜。实质上，它是市政机构的雏形，也是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前身。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外国人却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的政权机关。它无疑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另一个例子便是对“买办”的看法。本书著者在第五章的一条脚注中说：“买办集中体现了中西交接地带所产生的土洋混合的经济、商业体制”；“买办是西洋文明一切实际方面的灵巧而富有希望的学士”。而我们却认为买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代理人。

此外，著者在原著若干章节中所举的历史、地理数据和情节，其中有若干处与实际有出入。例如中美望厦条约的订立，系在1844年，而不是如原著第二、第五章所提到的1843年。

著者在本书导论中叙述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大批难民涌进租界，造成租界内地价暴涨，投机买卖盛行时，提到“三合会党徒在当地起事”。这无疑是指1853年9月至1855年2月以刘丽川为首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事件。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概括叙述这一事件的始末。小刀会起义军英勇善战，占领上海县城达十七个月之久，对清军作战时屡次打败清军，给与清朝封建统治者以巨大的打击。清军和外国侵略者知道用武力不能取胜，于是加紧封锁。1855年2月17日夜，起义军因粮尽援绝，从上海县城分路突围，起义到此结束。

本书第二章还谈到1854年发生的所谓“泥城之战”，说外国租界当局“使用军事上的优势力量和外交上的恐吓手段成功地把清朝官军驱逐出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外国当局

利用清朝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打击下摇摇欲坠的时机，企图通过要求全面“修约”来扩大其在华的特权。清朝政府对此踌躇不决，不肯迅即允诺，于是英美侵略军决定对上海县城外的清军进行威胁，旨在迫使清军早日屈服，接受其扩大侵略的条件。其时外国租界仅局限于洋泾浜以北，山东路以东的狭小地带，而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则扎营在泥城浜以西（外国人把泥城浜叫作“护界河”）。清军进攻县城的屡战屡败，引起外国侵略军对他们的蔑视，1854年4月4日就发生了所谓“泥城之战”。当天英美两国军队从租界向西出动，英军由南京路向泥城桥，美军由洋泾浜向“新跑马厅”（其时“新跑马厅”在泥城浜以东），向清军兵营示威。清军统帅许乃钊听到外国武装进逼，立即撤退，并派员向英美法诸国求和。翌日，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亲自出马赔罪，表示“停止敌对行动的愿望”，还作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

“泥城之战”可以说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一个转折点。“泥城之战”以后，清朝地方政权向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其结果便是出卖上海的海关，出卖租界的主权。1854年6月29日，为了取得海关税款来接济清军用以镇压太平天国，许乃钊、吴健彰接受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的建议，由英美法三国各派税务司一名，组设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以便管理海关，主持收税。从此，上海的江海关全部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同年7月5日，清朝地方政权又出卖租界主权，承认外国侵略者片面修订的所谓“新地皮章程”，允许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建立政权和警务力量。在此以前，租界仅有“道路码头委员会”，经管界内筑路、筑堤、修建码头、征税等事项，还不

过是一个普通行政管理机构罢了。如今按照新章，外国租界得“选派三名或多名组设经办处”，并且“设派更夫或巡捕队伍”，这就成为租界随即设立“工部局”和“巡捕房”的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成立，标志着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建立了殖民统治的政权机构和包括巡捕房、万国商团、各国防军在内的反动武装。租界成了“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与太平天国革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事件密切联系，并且对后来上海城市的成长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译者借此机会在这里作简要的补充说明。

还要说明的，本书正文除引文脚注以六角括号“〔 〕”标明之外，还有两种脚注：一种是著者原有的脚注，一律用星号“*”标明；另一种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正文的内容和涵义而由译者所加的脚注，一律用五角星号“☆”标明，以示区别。如果一页上出现第二个著者原有的脚注或译者所加的脚注，则用两个星号“**”或两个五角星号“☆☆”标明。

按语第二段，即涉及本书著者罗兹·墨菲简历的一段，系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若干种美国学界名人录编写而成，于本书付梓前又曾抄送张仲礼同志阅览，承他于百忙中为之订正补充。仲礼同志昔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与罗兹·墨菲为同窗，这部国外学者所撰写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上海史，是经他推荐而译成中文的。

本书参考图书文献目录部分，厚承林永侯同志不辞辛劳，根据国内外所出有关中国的重要西文图书目录，例如袁同礼编《西方文献中论述中国的书目》（Tung-li Yuan,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1958)、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编《东洋学文献类目》等等,逐条仔细而认真地核对校订,使目录内容益加翔实可信。又本书所附地图及图表,承冯祖清同志精细复制,一并在志谢。

1985年5月18日

目 录

译者卷首按语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政治和人口	(16)
	上海的政治地位——人口数字——上海和中国	
第三章	地基	(33)
	三角洲——建筑和排水——市区——给水—— 港口——地势起伏和气候	
第四章	位置	(54)
	上海港口可通达到的内地贸易区——海上航线 ——与上海旗鼓相当的几个港口——原料	
第五章	上海对外贸易的开放及其早期发展	(68)
	广州和通商口岸——上海的外国租界——租界 和贸易——与港口的斗争	
第六章	政治因素	(97)
第七章	运输路线和内地的贸易	(106)
	运输路线——茶叶和生丝——其他外贸商品	
第八章	港口的贸易	(138)
	1850 年以来的对外贸易——上海作为转船运输 的枢纽	

第九章	上海的食品供应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158)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和运输——上海米市——	
	本地米、外省米和洋米——其他食用商品——本	
	地米的过剩及其前途	
第十章	上海工业制造的布局	(196)
	统计数字的评价——工业制造的格局——市场	
	和原料——原料成本——煤炭和电力——工厂	
	的位置——工业位置的变动	
第十一章	上海的今天和明天	(237)
	译名对照表	(250)
	参考图书文献目录	(258)

本书所载地图、图表、表格一览

地图

一、上海的土地使用，1936 年	(21)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道	(58)
三、早期上海外国租界	(76)

图表

一、1840—1936 年上海的人口	(26)
--------------------------	--------

任何时期都没有完整的上海人口记录。图表系根据下列各种各样估计数字编成：福钧著《北华诸省茶丝棉产地三年漫游记》(1846年版)；麦都思著《上海及其近郊概述》，

载《华英会通》1850年第4期第3—17页；麦都思著《上海对外贸易开放回忆录》，载《中国与日本丛报》第12辑（1846年）第14—23页；施密特著《上海史摘要》，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报》第16辑（1874年）第234—248页；麦克莱伦著《上海史话》（1889年版）；《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1932年版）；《上海市年鉴》（1936年上海通志馆版）；等等。1852至1865年间中国难民涌进上海，对外国人来说，是重大的事件；这一期间大多数著作都提供了外国租界人口的每年估计数。至于1928年以前的其他年代，仅有的可资利用的估计数都是每十年调查一次而得的。两套数字都不过是近似数，尤其是包括全市各地界的人口总数极不精确。

二、1843—1936年上海外侨人数 (27)

外侨人口数字相当精确，因为每个国家的侨民都由该国驻沪领事负责管理，而大多数外侨又都住在外国租界范围以内。资料来源同图表一。

三、1859—1865年上海的贸易 (117)

长江航行开放对上海贸易所产生的功效。“再出口商品”包括转船装运至中国其他中心城镇的外国货再出口商品。资料来源：班尼斯特著《中国对外贸易史，1834—1931年》（1932年版）第52页。

四、1865—1935年上海的贸易 (146)

图表所列各个年代贸易总额的净值。资料来源：蔡公伟著《上海对外贸易》，载《中国经济杂志》第9期（1931年）第963—981页。

五、当地原始出口商品 (147)